



吴晗在对学生进行演讲

## 吴晗的图书馆学习与研究生涯

吴晗(1909—1969)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巨著皇皇、德艺双馨,是我国史学界璀璨星空中的一颗巨星,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吴晗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是与其早期笃行不倦、执著追求的图书馆学习与研究生涯密不可分的。

### 一、自强不息的农家学生

1909年8月,吴晗出生于浙江义乌吴店一个人口不过百户的小村落,他自幼聪明伶俐、慧心巧思,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无论严寒酷暑,他都坚持刻苦攻读家中祖传的《御批通鉴》和其他古书典籍,并且可以对某些文章进行大段的记忆背诵。1916年,7岁的吴晗进入育德小学,师从其父亲的世交好友杨志冰。杨先生博学多才,为人正直,他发现吴晗不但读书读得非常快,而且具有相当惊人的记忆力,于是他对吴晗的父亲说:“吴晗这个孩子实属不可多得的奇才,家里再困难,你也要让吴晗上学”,以此积极鼓励吴晗饱读诗书。在杨先生的悉心关怀和帮助下,吴晗在学业上的进步很快,师生之间也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感情。由于嗜书如命的吴晗记忆力惊人,又特别对历史书籍情有独钟,因此家中原先仅仅收藏的那本《御批通鉴》很快就被他翻阅得破旧不堪了。为了汲取新的知识营养,吴晗便将目光转移到乡邻亲朋,期冀向他们借阅各种可以增长见识和见闻的历史典籍文本,他甚至为了借阅一本书,经常能跑几十里路。有的时候,人家见他是乳臭未干的毛小孩子,不太情愿将家中珍藏的贵重史书借阅给他,他便苦苦央求对方允许其蹲在门口速读。这样,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吴晗就已经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烂熟于胸,由于其读书又多又快,当地人称他为“蛀书虫”。其实在吴晗的心里,他一直都想拥有一个属于个人的“小小家庭图书室”,然而那时吴家的境况比较贫寒,根本无力使他购买和收集大量的历史典籍书册和其他各类小说话本。但是,

为了读书,吴晗是费了很大周折的,在他上中学时,为了购买一本书,他连铺盖卷都卖了,回家后还曾遭到父亲的一阵痛打,他的大妹吴浦月眼见她和蔼可亲的哥哥因为购书而遭到了父亲的痛揍,就将自己一直积攒的压岁钱全部送给了他,在中学期间,吴晗就是如此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妹妹的资助,购买了属于自己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中国“前四史”,为其适时对这些精品典籍进行精心研读创造了较好条件。

### 二、焚膏继晷的燕大馆员

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在本村椒峰小学任教两年之后,他进入杭州的之江大学读书,一年后又赴上海求学,以优异的文史成绩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并在这里开始了人生的巨大转变。当时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并非旁人,而正是学贯中西、文史兼通的著名学者胡适。胡适1917年学成归国后获聘北京大学教授,并主持创立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同时兼任英文科主任,由于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倡议“文学改良”和“白话文运动”而声名鹊起,赢得了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赞誉。由于时局紧张,胡适暂时远离风声日紧的北京而来到上海担任中国公学的校长,同时兼为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对于偏爱中国文史的吴晗来讲,这自然是其不会错过的课程,而胡适关于中国文化的精辟点评也彻底使吴晗为之深深折服,将胡适的治学之道奉为可供借鉴的学习方法。1930年上半年,在积累足够的史料和经过缜密的思考之后,吴晗洋洋洒洒地写就了一篇名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课程论文递交胡适并深得其高度赏识。之后,在胡适的举荐下,大东书局购买了吴晗的这部文稿,并支付了八十元稿费。不久,胡适辞去中国公学的校长职务回到北京,而为了追随胡适,吴晗最后决定也去北平读书<sup>[1]</sup>。

1930年8月,吴晗来到北平。本来按照原先计划,他想直接转入燕京大学就读,但是由于燕京大学一直对于学生的英文成绩非常看重,这使得英文基础较弱的吴晗未能实现最初的夙愿。于是,吴晗利用当时出卖论文的八十元稿费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公寓里暂时租住下来,并且每天步行到北平

图书馆阅读书籍。但是,因为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囊中羞涩的吴晗毕竟不得不考虑填饱肚子等基本生存问题,后来,经一位对他的学识非常器重而恰好来北京造访的上海中国公学教授推荐,吴晗找到了燕京大学历史教授顾颉刚请求帮忙。与吴晗见面约谈后,顾颉刚欣然答应了为其寻找一个合适工作的请求,据《顾颉刚日记》1930年9月30日云:“打电话与吴晗,告以图书馆事已成。”这样,经顾颉刚介绍,吴晗在该年10月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而这个工作对于当时如饥似渴刻苦攻读的他来讲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事情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吴晗如鱼得水,焚膏继晷,饱读和浏览了大量的古代文史典籍,对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和发展史了如指掌,颇有心得。

比如吴晗阅读过一本明代吴之器编撰的《胡应麟传》文稿。据该文考证,胡应麟卒年是明万历三十年,也就是说胡应麟是在52岁病亡;而据燕京大学历史教授顾颉刚在《四部正伪序》中的考证,胡应麟的在世年月至少应在60岁以上。孰是孰非?吴晗认为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至少以他原有的知识判断似乎更为倾向于前者。吴晗认为,尽管顾颉刚曾经有助于他,但在历史学术问题上,只有正确与错误的,他不能因为顾颉刚曾是他的恩师,就断然放弃不能质疑顾颉刚研究结论的尝试。于是,吴晗借来《少室山房文集》和《弁州四部稿》,花了将近半月时间,对书中关于胡应麟生平的事迹进行极为精确的梳理,然后,他参考了另外一些与胡氏同时代的文人诗集和地志,加之参阅《明诗综》、《全浙诗话》、《太函集》诸书,于1931年初起草完成了一篇大约三四万字的论文——《胡应麟年谱》,证明了《胡应麟传》中的说法是较为精确的。在该篇文章完成之后,吴晗将其初稿寄给胡适,并附信希望胡适能“费一点工夫,多多指教”。在收到这篇初稿的次日,胡适就写了回信,对吴晗的这个初步研究成果给予了特别赞赏,由此也更加器重吴晗,两人关系日渐密切<sup>[2]</sup>。

### 三、牛角挂书的清华学子

为了全力准备大学入学考试,1931年夏,吴晗辞去了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结果他的文史和英语都获得满分而数学却得了零分,北京大学按



夏承焘、吴彦闻夫妇

# 现代词学家夏承焘 的抗战爱国思想

□ 金荣洲

马占山旅长部，又战胜日本军。甲午凉山之后，此为快举，思为一词记之。”<sup>[1]</sup>对马部的获胜给予了最高的褒奖，认为是19世纪末中法、中日战争以来中国在抵御外侮方面取得的一次令人振奋的胜利，极大地增进了中国人抗敌的自信力，非常值得张之。我们结合稍后写就的《贺新凉·阅马占山将军嫩江捷报》一词来说，扬之愈高，隐含作者爱国感情愈深。几个月后，在得知马氏“变节”后，夏承焘即刻表现出了另一种反映：“闻马占山已软化，可恨可恨。”<sup>[2]</sup>在痛恨的同时，鉴于当时的行情，又表达出了一种痛惜之情：“闻马占山被刺已死……市上马占山香烟才开市，此人乃末节不终，堪浩叹矣。”<sup>[3]</sup>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马氏当时非“变节”，而是“诈降”，也没有“被刺死”一事，因马氏前后表现出的“判然”，在外人没能了解到真相的情况下，按照传播通常的规律，其“末节不终”的行为将会有不同说法的传出甚至是流言四起，作为极其关注此事的局外人，夏承焘难免不从相关的传闻中了解到事态的“发展变化”。然正是从他的这一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夏承焘所展现出的发自内心的抗战爱国之情。随着日寇侵华势态的日渐加剧，夏承焘的这种爱国热情也与日俱增，如他在1936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于学生壁上见大公报访员范长江记国军攻百灵庙之役，大为兴奋，当时欲挥拳击玻璃碎之。”<sup>[4]</sup>百灵庙战役是在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在傅作义将军领

导下取得的一次重大抗战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是值得人们庆贺的一件大事。而此刻的夏承焘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反映，一种积压已久的亢奋，终于借此得到了释放，足见他此时抗战爱国热情之高涨和心情之急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文人，夏承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在积极关注时政的过程中，将自己的一腔抗战爱国热情予以了充分的展现。

## 二、写诗作词，寓于爱国情感

作为一个时刻能够关注社会现实状况的作家，无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于已是满目疮痍的世界中去，从中摄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夏承焘是词人，同时也作诗，“值八年抗战，流离转徙，抚事伤时，其爱国热忱与民族节概，每不自觉流于笔端”<sup>[5]</sup>。这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之关键所在。此举诗、词各一例，以见他寄托在作品中的抗战爱国之情。诗如写抗击日军入侵上海的《沪战壮士歌》：“同气相残悯汝曹，东瀛妻母梦徒劳。归来满袖黄人血，含泪灯前看大刀。”这场发生在抗战初期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战期间战斗最惨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诗作没有直接去描绘激烈的战争场面，而是站在双方人民的立场，认为它违背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意愿，非正义之事连有良知的日本人也能感知到它必败的结局；作为我方守将，则深怀杀敌报国保卫大上海的普遍心愿，它暗示了此役中国军民虽伤亡惨重，但粉碎了侵略者速亡中国的妄想，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深刻地抒发了作者抗战爱国的强烈感情。词如《水龙吟·丁丑冬偕鹭山谒慈山叶水心(适)墓，时间南京沦陷》：“九原人比山高，海云过垄皆奇气。草间下拜，风前共忍，神州凄涕。梁甫孤吟，南园尊酒，谁知心事。招放翁同甫，精魂相语，南渡恨，鹃声里。沉陆相望何世。送千鸦、苍茫天水。遮

夏承焘(1900—1986)，杭州大学教授，著名词学家，毕生致力于词学的研究与教学。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夏承焘早年经历了中华民族备受异国欺凌主要是日本侵华这一屈辱的时代，和大多数有良知的国人一样，他在此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伟大的抗战爱国思想。然作为学人，他不像亲临抗战一线的爱国将士那样亲身杀敌报国，而是用文人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思想与爱国精神。

## 一、关注时事，流露抗战爱国热情

夏承焘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治词经历，称“只是从故纸堆中寻求自己的天地”<sup>[1]</sup>。其实，这不过是他过谦的话，他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反，在治学的进程中，他常能做到关心时局，与时俱进，表达爱国情感。如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一次日本蓄意挑衅中国的军事事件，更是一次政治事件，作为受害者，中国军民作出了应有的回击，像马占山在东北的抗日即为一例。对此夏承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报，黑龙江

照校规没有录取吴晗，但清华大学却看中了他的文史才华而破格录取了他，于是吴晗有机会进入清华大学专攻明史研究。

在清华大学期间，受到时任北大教授胡适的举荐，吴晗获得了“整理清代档案”的工读生待遇，以解决个人生活燃眉之急。清华大学藏书丰富，这对于吴晗的治学研究非常有帮助，他每日到学校图书馆浏览群书，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由于涉猎比较广泛，据吴晗自己的回忆说：“当时我自己找书阅读，没有人指点，读了很多好书，也读了很

多坏书。”勤奋刻苦的吴晗做事总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自己了解和熟知目录学，自己探究和掌握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和地方方言，自己动手制作知识卡片，而对于阅读之后的点滴思考，他也能随时写成读书笔记或者阅读札记，甚至长短不一的文章。在清华学习期间，吴晗的学习用功是出了名的，他经常废寝忘食、牛角挂书，以至于获得了“太史公”的美誉<sup>[2]</sup>。“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凭借着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文笔清雅、思路广阔的吴晗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先后写下

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的青睐，许多文章还发表在《清华周刊》、《燕京学报》、《文学季刊》之上，这些都为他日后开展更加精深细致的明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 参考文献

- [1] 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大学生时代的作品和治学道路[J]. 北京师院学报，1981(3).
  - [2] 苏双碧，王宏志，吴晗的治学道路[J]. 浙江学刊，1983(2).
  - [3] 宋连生，吴晗的后二十年[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
-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图书馆。